



从历史政治学看党史学习方法论

□ 杨光斌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

何为历史政治学

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

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

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

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

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

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

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

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

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

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

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

结论。

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 and 知识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理论传播征文选登

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喉舌，必须充分履行肩负的职责使命，切实办好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节目，在全社会带头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做好理论传播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使人民群众从中获取强大的思想力量，进而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

把握重大意义

办好理论节目是创新理论学习的重要方法。广播电视理论节目的创办，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无差别、零门槛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接触、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机会和平台，其趣味性和互动性可极大提高群众的学习兴趣，有效解决理论触及本质、接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理论学习的需要，实现从教义化到形象化的转变。因此，广播电视理论节目既是理论教育的手段创新，也是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声画教材。

办好理论节目是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路径。理论节目的最终目的是凭借先进思想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的理论解释力，让观众在深刻理解领会之后，观照现实、指导实践。纵观当前引起较大反响的理论节目，无一不是通过深入田间地头，聚焦百姓真实生活，回应社会热点难点，让观众通过镜头走进、伴随、沉浸于具体的人物、案例和场景；同时，节目还“就事论事”设置讨论、问答、点评环节，理以事显、事以理成，从而碰撞出共识和共鸣。正所谓“田间地头拉家常，一问一答谈发展，一边答疑解惑出谋划策，一边趣味盎然融合传播”。为此，在理论节目中，抽象和平面的理论变得具象和立体，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过程变成行进式、交互式，使得为人民群众提供科学方法论的过程更为系统、直观、有力。

办好理论节目是媒体自我赋能的重要手段。伴随传媒格局的演进，广电媒体在信息传播、文化传承、舆论引导、服务大众、休闲娱乐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理论节目通过对理论的阐释、解读、传播，能够有力推动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时代化，从理性层面促进受众形成共识，使长期属于广电媒体短板和弱项的理论内容传播功能得到提升，更好肩负起主流媒体社会凝聚、动员、组织、引导的使命，实现自我赋能。

把握基本方向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主线。理论节目是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载体，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条鲜明主线，贯穿于理论节目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只有坚持了这条主线，理论节目才有灵魂。理论节目必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在“是什么、不是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使人民群众对所信仰的理论、所获得的思想力量形成积极认同、坚定信奉和执着追求。

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理论节目是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平台。理论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现实的深厚沃土中，本就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理论节目想要与人民群众同频共振，就要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其背后深层次的思想、伦理、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深入地思考、辨析和阐释，最终达到团结人心、凝聚共识的效果。选题视野宜宽不宜窄，社情民生、改革前沿、城市发展、科技文化等都可纳入关注范围，要注重学术探索与改革实践的结合、理论热点和现实焦点的结合。

把握科学方法

科学处理好理论节目深度与通俗的关系。理论很厚重，传播要轻巧。广播电视是靠视听效果实现最优传播力的媒体。理论节目的文案创作，必须运用理论底蕴深厚而又表达通俗、质朴真挚的“大白话”，巧妙运用声音元素和视觉元素，适当融入演讲、动画、说唱、竞猜、投票等多种元

理论节目怎样才能办好

□ 杨颖

素，为受众提供接受度高的视听体验，让百姓乐意学、坐得住、听得懂、用得上，实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浙江卫视电视理论节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富起来》就增设了义乌“敲糖帮”帮主现场还原“鸡毛换糖”场面、宁波粮票收藏爱好者展示各个时期粮票等鲜活元素，产生良好传播效果。若要使原本根深的理论通过电视话语的解读向大众化靠近，很大程度依靠创作者对理论的理解程度和驾驭能力。这需要创作者从体系层面认识和把握理论，重视理论逻辑通过新文本、新语态、新风格再现，使之为群众理解和掌握。

科学处理好理论节目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作为理论节目的创作者，守正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既是本、又是源，既是根、又是魂，必须带着信仰、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追求真理、传播真理、践行真理，切实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创新就是顺应时代发展，借力新兴技术，创新开办方式，提高传播质效。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制作的电视理论节目《社会主义“有点潮”》，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将历史场景、历史人物搬到现场，呈现出一个个穿越时空的微故事；东方卫视特别节目《不负新时代》，作为全国首档“浸入式大型访谈节目”，以全新视角打开观众视野，重视加大新媒体宣推，将完整节目和短视频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播出，赢得“后浪”们的观看、评论、分享。

科学处理好理论节目对内与对外的关系。思想的力量最具穿透力和传播力。办好广播电视理论节目，我们要统筹内宣和外宣、网上和网下，做中国理论和思想中国话语的阐释者、中国声音的传播者。现实中的传播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符号以及环境、条件等的不同而更加复杂。要求我们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客体、不同的受众，运用不同的方法，采取不同的方式，力争取得共同的内宣效果，达到共同的内宣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理论也要走向国门、进军世界，需要我们掌握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说话之道，让中国方案在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中获得更多的共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做到从表层传播到深层浸入，从单一传播到立体呈现，从理性传导到情感共鸣，从直接教化到间接引导，从短暂时性传播到持久性传播，让中国理论更好走向世界。

（作者系四川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党委副书记）

坚持当“老百姓的官”

□ 李照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在这一点上，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而且要终身牢记。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讲，这既是谆谆告诫，更是殷切期望，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时刻自我警醒，认真主动践行。

当“老百姓的官”，就要心中装着百姓。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我们党成功的秘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每名党员干部要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俯下身子为群众办事，靠真心、真情、真诚赢得群众支持。经常进行自我检

视，看看工作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的福祉，真正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做到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紧抓什么、推进什么。把群众的小事作为自己的大事，把群众关心的事情作为工作重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老百姓的官”，就要注重请教百姓。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千难万难，问计群众就不难。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党员干部来自人民，就要扎根于人民。忘记了人民，脱离了群众，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什么事也干不成。只有真正俯

下身子、放下架子，深入到群众当中，从群众中汲取养分，才能增长才干、增加干劲，好办法新办法才会多起来。“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如果自诩高明、高高在上，游离于群众之外，或凌驾于群众之上，不但群众不会买账，工作也无法推进，自己也很难收场。“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先生与学生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先生可以变成学生，学生也可以变成先生；只有当好人民的学生，才能当好人民的先生，才会“唤起工农千百万”，才能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更好地带领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当“老百姓的官”，就要时时敬畏百姓。心有所畏，才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心存敬畏蕴含的是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是对“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价值理念的推崇。党员干部如果失去对人民群众的敬畏，就会自我膨胀，就会在私

心杂念的滋长中慢慢放松党性修养，在物欲诱惑面前渐渐丧失原则立场，就容易腐化堕落，走到党和人民对立面，由“好同志”变为“阶下囚”。对人民群众心存敬畏，就要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明白，级别再高，也高不过人民；权力再大，也大不过制度。权力来自人民，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与重托，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不带一点私心、不动一丝杂念，“俯首甘为孺子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